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影视字幕翻译的适应性选择与文化重构——以电影《红字》为例

孙如如

山东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00

DOI:10.61369/EDTR.2025040009

摘 要 :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桥梁, 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互动意义, 而字幕翻译更是电影跨文化交流的核心纽带。以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红字》为例, 其字幕的翻译质量直接影响着影片跨文化传播的效果。生态翻译学强调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性考量, 主张在语言、文化和交际层面进行适应性选择与转换。影视字幕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 更是文化意义的再创造。在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框架下, 文化重构体现在译者基于目标语文化生态, 对源文本文化要素进行适应性选择、创造性转化与动态平衡。在该理论视域下, 将着重以 1995 年由罗兰·乔菲执导的同名电影为例, 分析该版本字幕翻译的优点及其不足之处, 探讨字幕翻译在语言、文化和交际层面的转换策略, 从而丰富字幕翻译研究领域, 并为字幕翻译实践提供参考。

关 键 词 : 生态翻译学; 三维转换; 字幕翻译; 《红字》

Eco-Translatology-Based Subtitle Translation: Adaptive Strategies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Scarlet Letter*”

Sun Rur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000

Abstract : As a bridge for cultural dissemination, films play a vital role in cultural interaction, with subtitle translation serving as a crucial link in cross-cultural cinematic communication. Taking the film adaptation of the classic literary work “*The Scarlet Letter*” as an example, the quality of its subtitle translation directly impa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ilm's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Eco-translatology emphasizes adaptive considerations within the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advocating for adaptive sel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t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levels. Subtitle translation is not merely a linguistic conversion but also a re-creation of cultural meaning. Under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 of Eco-translatology,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manifests in the translator's adaptive selection, creative adaptation, and dynamic balancing of source-text cultural elements based on the target-language cultural ecology. From thi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focuses on Roland Joffé's 1995 film adaptation, analyzing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its subtitle translation. It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at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levels, thereby enriching the field of subtitle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providing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future translation practices.

Keywords : Eco-translatology;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subtitle translation; “*The Scarlet Letter*”

引言

影视字幕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文化媒介, 其翻译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国际传播效果。近期, 商务部官网转载文章《传播中国电影“字幕”很重要》一文特别强调: “影视剧字幕的作用应该被重视, 字幕的翻译内容是否‘信达雅’, 字幕的字体选择、设计大小是否有利于在观影条件下被阅读理解, 都是影响一部影视剧能否在海外成功传播的重要因素”^[1]。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字幕翻译在影视作品国际传播中的核心价值。当前, 随着网络技术蓬勃发展, 自由字幕组大量涌现, 在提升翻译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质量问题, 比如网络用语滥用导致语言风格混乱; 翻译腔过重造成表达生硬晦涩; 文化意象处理不当引发语义偏差等。这些问题不仅降低了观众的观影体验, 更导致了文化误读。鉴于此, 探讨影视字幕翻译中的语言表达、文体风格、文化元素呈现以及目标语观众的接受度等, 是提升字幕翻译质量的关键所在。

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的经典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 1850)兼具社会批判与心理深度, 通过电影改编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以1995年由罗兰·乔菲(Roland Joffé)执导的同名电影为例, 该影片在保留原著核心情

节的同时，通过强化视觉表现的新叙事手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表达。这种改编既延续了原著的文学价值，又呈现出新的艺术特征，这对字幕翻译提出了双重挑战：既要准确传递原著的文化内涵，又要忠实呈现电影的视听语言特征。生态翻译学针对语言、文化和交际维度的翻译质量，提出了相应的适应性选择策略，在该理论视域下，拟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分析该电影字幕（选取的中文字幕来自自由字幕组译制）翻译的适应性选择机制，探讨文化重构策略及其受众接受效果，以期为提升影视字幕翻译质量提供可行性方案。

一、字幕翻译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外语影视作品的大量引进，国内对影视字幕翻译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研究方向有：翻译理论的应用与翻译方法探讨，国内多数学者将国内外翻译理论应用于影视字幕翻译研究并探讨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比如，将目的论等翻译理论应用于字幕翻译研究，综合运用直译、意译等多种策略解决语言通俗性与技术规范问题^[2]；另有研究从多模态视角切入，分析影视文本的多模态特征及其对字幕翻译的影响^[3]；在文化传播研究层面，研究字幕翻译的跨学科特性，同时探索其翻译策略。比如，基于翻译传播学理论，从传播主体、受众等维度提出翻译策略优化建议^[4]；在跨文化视域下，强调翻译应在保持原片文化内涵的同时确保语言流畅，以促进文化传播^[5]。

目前国内尚未有对小说《红字》改编电影的字幕翻译的相关研究，而该小说作为经典文学作品，其影视化改编具有丰富的符号隐喻和跨文化叙事张力，字幕如何传递这些核心元素亟需系统性探讨，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且现有影视字幕研究多集中于热门商业作品，对文学经典改编影片的关注相对较少，可拓展字幕翻译的研究对象范畴。提出“文化重构”作为三维转换的延伸维度，分析译者如何通过补偿策略（如注释、意象替换）处理不可译性，丰富生态翻译学的应用场景。

二、字幕翻译的特点与要求

影视字幕翻译具有显著的时空约束性^[6]，空间维度上受限于屏幕显示区域，字幕通常不超过两行；时间维度上需严格保持音画同步，否则观众无法控制字幕的呈现速度。因此译文语言应简练且逻辑清晰，不宜冗长，避免复杂句式结构，符合目的语观众的语言表达习惯，避免“翻译腔”，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传达最重要的信息，确保观众能够迅速理解，以增强观众的观看体验。

字幕翻译还需兼顾文化适应性与情感传递。字幕翻译需要捕捉和传达对话中的情感和语境，帮助观众理解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在准确传达原意的同时，还应当深刻理解影视作品的文化背景，符合目标文化的表达习惯，以免产生文化误解^[7]。因此，字幕翻译需要实现三重平衡：一是语言形式与情感表达的平衡，二是文化保真度与观众接受度的平衡，三是即时理解与艺术再现的平衡。在处理文化专有项时，译者需要在异化与归化策略之间做出审慎选择，既要避免文化失真，又要防止文化隔阂。

三、《红字》字幕翻译中的生态适应性策略

（一）语言表达的适应性转换

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特征涵盖两大方面：“适应”和“选择”，

即必须顺应翻译生态环境的条件，依据翻译生态环境的“角色”来决定译文的取向。语言维度的适应性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针对语言形式所开展的多维度、多层面的适应性选取与转换过程^[8]。

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适当将英语的形合句转换为汉语的意合句，以增强逻辑性和连贯性。同时，还需要充分考虑观众的词汇量和理解能力，在翻译过程中应更加注重词义的选择，适当调整语言形式，使字幕更易理解：

例1：

源文：I'm not all counterpanes and coverlets. Every spare moment, I read.

译文：“我在家里可不只是洗洗涮涮，只要有空我就会读点书。”

源文采用了较为文雅、略带古典色彩的表达，暗含说话者的身份或所处环境的特定氛围。源文“counterpanes”和“coverlets”使用具象的床上用品指代家务劳动，属于英语的借代修辞。译文舍弃实物直译，转化为动词短语“洗洗涮涮”，使动作具象化。中文惯用动态表达概括家务，更符合汉语生活语境；叠词结构（AABB式）天然携带口语化、生活化特质，与源文“counterpanes and coverlets”的头韵形成音韵生态对应。

影视翻译的核心在于使译文在词汇、句法、修辞、语用等层面适应目标语的语言生态环境，同时保留源文的核心信息与风格特征。英语可通过名词堆砌传递隐含逻辑，中文需补充连接成分以符合形合到意合的语言习惯。同时，不仅要关注语言形式的转换，还需与文化维和交际维相结合，形成多维度的翻译策略，确保译文在各层面都能达到最佳效果。

（二）文化传递的适应性重构

“文化维的适应性重构”是指译者在翻译时重视双语文化内涵的传达与解释。译者应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本质和内容上的差异，在进行语言转换的同时，确保整个文化系统的适应性，全面考虑所属文化的背景与内涵^[8]。这一过程的核心任务是解决文化缺省问题，避免观众理解断层。影视作品中常常包含丰富的文化元素，如习俗、价值观、历史背景等。通过“文化维的适应性重构”，译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源语文化内涵，并将其准确地传递给译语观众：

例2：

源文：Have you forgotten it is the Sabbath?

译文：“你忘了吗，今天是安息日。”

“Sabbath”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中特定的神圣休息日，是一周中最神圣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必须停止一切工作，专心敬拜上帝，听牧师布道，不可做任何违背上帝旨意的事情。中文直接译为“安息日”，借用了佛教和本土化基督教术语。这种处理既保留了宗教文化的严肃性，又依托译语中已有的文化认知框架，避免了冗长的注释。且此处译文默认观众具备基础认知，体现了对译语文化接受度的判断。在中文翻译中，“安息日”虽然字

面上对应了英文的“Sabbath”，若目标观众对宗教文化陌生，译者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整，比如加注“犹太教圣日”，或改译为：“你忘了吗，今天是安息日，你得去听布道。”增译可以传达给观众更具体的信息，体现安息日的重要性，也能够推进剧情的发展，为男主人公布道做铺垫。

影视字幕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让观众获得与源语观众相似的观影体验。译者需要更好地平衡文化内涵与语言表达，使译文既忠实于源文，又符合译语观众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

例3：

源 文：“When first we came, they’ d be dancing round the maypole. And a whipping post stands where the maypole used to be.”

译文：“我们刚来的时候，他们都围着五朔节花柱跳舞，原来的五朔节花柱变成了鞭挞柱。”

五朔节（Maypole）是欧洲传统春季节庆符号，象征着春天和丰收，而鞭挞柱（whipping post）则象征着惩罚和压迫，此处形成了对比修辞。这两种意象在西方文化中有明确的象征意义。译文直译保留了两个文化意象，尽可能忠实于源文。但整体结构较为生硬，且该文化意象对中文观众来说不够直观，容易造成误解。因此，在保留这两个核心文化意象的基础上，可将译文进行优化：“我们刚来的时候，他们还围着五朔节花柱欢快起舞，而如今那里却竖起了令人胆寒的鞭挞柱。”首先，增加对比感，从“欢快起舞”到“令人胆寒”，突出了从欢乐到压迫的转变，使观众更容易理解其中的变化和象征意义。其次，增加转折，传达了时间流逝和情境变化的情感，增强了戏剧效果。

生态翻译学强调翻译活动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更是文化生态的适应与选择的过程^[9]。在源文的文化符号具有高度象征意义时，译者需优先保留其核心文化功能，而非字面形式。对于具有深厚文化背景的专有名词（如宗教概念），采用译语中已有的规范译法，降低认知障碍。另外，译者需评估目标观众的文化背景，决定是否需加注、简化或替换文化负载词。

（三）文体风格的适应性选择

文体风格的适应性选择与交际维度的适应性转换均旨在使译文在目标语言和文化环境中达到与源文相同的交际效果。而交际维度的适应性转换则侧重于双语交际意图的转换，确保源文的交际目的在译文中得以精确再现^[8]。

交际维强调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源文的交际意图，即确保译文在目标文化中能产生与源文相似的情感、态度和互动效果^[10]。影视字幕翻译的语境性很强，角色的台词往往与画面、音乐和情节紧密相关。在“交际维度”的指导下，译者需要结合上下文语境，确保译文能够准确传达角色的情感和意图。对于一些隐含意义或双关语，译者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使观众能够快速理解其深层含义：

例4：

源 文：“Be not silent from some mistaken pity and tenderness for him. For believe me, if he could step down from a high place, and stand beside you on your pedestal of shame, it would be better than to carry a guilty heart through life.”

译文：“你不要因为对他有任何错误的怜悯和柔情而保持沉默。相信我，让那个人站出来，与你并肩站在这里受辱，也要好

过让他带着一颗愧疚之心悔恨终生。”

源文是强烈的劝诫语气，译文采用否定祈使句，比“不要沉默”更凸显中文规劝表达。男主角在女主角受罚时发出“警告”，其话语中包含双关语，既出于牧师身份的无奈，又暗含对爱人的保护。译文通过增强劝诫情感表达，生动展现了男主角内心的挣扎，配合电影的画面、音乐和剧情，更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提升了字幕的可接受性。译文将“pedestal of shame”（耻辱柱）译为“受辱”，弱化了具体物体，明确传递了“公开羞辱”的交际意图。且源文是复杂长句，译文通过适当增译和意译，运用分句和逻辑连接使话语更加流畅，增强了语言的生动性和感染力，符合中文交际习惯。

译文通过语气强化、比喻意象的适度归化有效传递了源文的劝诫力量和道德诉求，实现了交际目的，增强了译文的可接受性。

在影视字幕翻译中，交际维通常占据主导地位，字幕翻译应在多重要求间取得平衡，既确保即时交际效果，又保持适当的文体风格，同时完成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译者应通过精妙的维度调控，使译文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获得最佳“生存”状态。

四、结束语

优秀的字幕翻译是译者作为“文化生态调节者”，在语言精确性、文化可解性、交际有效性和文体适切性之间不断寻求最优解的创造性过程。从生态翻译学的“适应与选择”出发，影视字幕的文化重构的本质是：一是适应性，根据目标语文化生态调整策略；二是选择性，保留核心文化符号，舍弃次要信息；三是创造性，以“译者为中心”进行语言创新，弥补文化损耗。翻译是译者适应源语与译语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需在“语言—文化—交际”三维中动态平衡，最终实现文化信息的“生存”与“长存”。影视字幕翻译在跨文化沟通中至关重要，通过多维度的适应性选择和文化重构，译者能更好地传递电影文化内涵，增强电影影响力，助力观众理解异国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促进全球电影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注：本文中使用的案例分析字幕来源于网络资源，发布日期为2022-08-24 21:14:21，相关网站 <https://assrt.net/xml/sub/649/649895.xml>。

参考文献

- [1] 王海宁.《字幕非小事能添彩也能添堵》[N]. 辽宁日报, 2023-04-19(09).
- [2] 尹小菲. 目的论视域下电影字幕翻译策略[J]. 电影文学, 2024, (18): 130-134.
- [3] 杨仕章, 薛茜文. 核心模态整合视角下的影视字幕翻译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23, (03): 58-66+121.
- [4] 廖雪汝, 赵妍. 翻译传播学视阈下的电影字幕翻译研究及启示——以电影《绿皮书》为例[J]. 四川戏剧, 2020, (05): 82-85.
- [5] 牛倩. 多模态话语分析下电影《长安三万里》字幕翻译经验与启示[J]. 电影文学, 2025, (05): 145-149.
- [6] 李运兴. 字幕翻译的策略[J]. 中国翻译, 2001, (04): 38-40.
- [7] 李和庆, 薄振杰. 规范与影视字幕翻译[J]. 中国科技翻译, 2005, (02): 44-46.
- [8]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 2011, 32(02): 5-9+95.
- [9] 郑莉. 生态视角下的《泰坦尼克号》字幕翻译研究[J]. 电影文学, 2014, (08): 161-162.
- [10] 聂韶峰.《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生态翻译学视角[J]. 电影文学, 2014, (07): 152-153.